



高校学术文库

论语

集义新编索解

易鑫鼎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高校学术文库

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论语集义新编索解

易鑫鼎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集义新编索解 / 易鑫鼎著. —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3. 5

ISBN 978-7-5656-1504-7

I. ①论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论语》—注释
③《论语》—译文 IV. ①B222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3188 号

LUNYU JIYI XINBIAN SUOJIE

论语集义新编索解

易鑫鼎 著

责任编辑 张慧芳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48

电 话 68418523(总编室) 6898246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
北京泽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 19.875

字 数 443 千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绪 言

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把《论语》全书内容相近的各章作了集中编排，分为下列十四篇：

- 孔子自明本志第一（58章）
- 孔子论历史和历史人物第二（57章）
- 孔子论礼、乐第三（31章）
- 孔子论《诗》第四（7章）
- 孔子论孝道第五（11章）
- 孔子的教育思想第六（22章）
- 孔子论“仁”第七（29章）
- 孔子论“成人”第八（66章）
- 孔子论“君子”第九（55章）
- 孔子论“为政”第十（42章）
- 孔子的生活情态第十一（38章）
- 孔子对诸弟子的评论第十二（44章）
- 诸弟子对孔子的称颂第十三（9章）
- 孔门诸弟子的言行第十四（43章）

我这个想法，可说由来甚长。当我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，在五爷爷家头一次翻看了《论语》，认得一些字，看见书中前后都有“仁者”、“君子”这些词语，远不如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顺口、好记。我问五爷爷：“孔夫子怎么老说‘仁者’、‘君子’这些话呢？为什么不一次说清楚呢？”不料五爷爷摘下眼镜，瞪大眼睛严肃地说：“这是‘经’！这是圣人的教诲！一个‘仁者’，一个‘君子’，不来来回回说，能说得清楚吗？圣人苦口

婆心教诲我们，许多人还是不用心记，不用心想，这就是良心变坏的根子嘛！……细伢子，不懂事，莫要乱说了，懂吗？”我知道他学问大，火气也大，就不懂装懂点头承认了。此后许多年，我少有深入学习《论语》的条件和机会，对《论语》的疑问却没有消除，还常引起思考。退休以后，我琢磨幼年间的疑问，因而有了这本“集义新编索解”。旧本《论语》每篇都是取首章首句两个字作标题，各章之间有联系的不多，多数是各自独立成章的，每篇的内容较为驳杂，两千多年来一仍其旧，这是“无标题散文”创始之例。据上述编排，“诸弟子对孔子的称颂”9章、“孔门诸弟子的言行”43章，再加上一些没有明显标记而经研究不是孔子之言的还有10多章，这些加起来，总共有60多章不是孔子之言。它表明《论语》不是孔子的“专集”，而是多人的“合集”。这个“集义新编索解”，对《论语》的内容是没有影响的，反而有利于集中对比揣摩；它对于初学者、专业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，都提供了随手翻阅的方便。因此，我估计，这个小小的“改革”，能够赢得读者的喜欢。

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，我的这个“改革”不属首创，前人按内容解读《论语》早有先例。清代焦循的《论语通释》分十五个专题：（1）一贯忠恕，（2）异端，（3）仁，（4）圣，（5）大，（6）学，（7）多，（8）知，（9）能，（10、11）义，（12）礼，（13）仕，（14）据，（15）君子小人。现代学者郑麀（相衡）的《古籍新编·四书》一书，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五月由美洲世界书局世界出版协社出版，该书采用了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底本，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均作了新的编排。《论语》分成十一篇，第一“自述”（37章），第二“习性”（36章），第三“事迹”（45章），第四“弟子”（55章），第五“人物”（46章），第六“评论”（13章），第七“政治”（46章），第八“德行”（80章），第九“处世”（73章），第十“君子”

(43章)，第十一“阙疑”(31章)。此书按内容分篇，可能借鉴了焦循的做法，但他把所有的“旧注”删除了，有些章只加了十多字简要的说明，其用意可能是让读者去揣摩原文，不被前人的注解误导。郑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家，有记载说，他是广东潮阳人，早年留学哈佛学哲学，后转剑桥学历史，回国后在清华任教，是清华创建政治学系的四教授之一。他用力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，整理了十三经，出版的除上述《四书》外，还有《中国古籍校读新论》、《古籍新编老子》、《燕丹子（汉英对照）》、《处世箴言（中英对照）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。可惜的是，他的经历和业绩被时代大潮淹没了，甚至连他的生卒年也难见确切的记载。

拙著《论语集义新编索解》，和前人做法颇不相同，以促进中、西文化接轨为出发点，不薄古人和今人，为后学读《论语》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方便。所作“译文”，是在揣摩原文基础上写成，其间也借鉴了前人的一些译述；所作“注”，颇费了一番工夫，在研读名家注本和近代学人论述的基础上，仔细作了筛选；凡有利于理解原文并富有新意的论说，力求准确引述，以供借鉴；客观上也有意对某些不恰当的注解作了补证；所作的“解”，大体上有两个用意，一是开掘原文的内涵，二是拓展读者的视野或说是思维空间。梁启超说，《论语》所记多是“庸言庸行”，也就是“庸常之言”。拙“解”多少受了些它的影响，大多用简短通俗的文字写来，说些普普通通的道理，没有拔高空谈，也没有“惊人之笔”，这可说是“一得之愚”吧。

往下，集中说明《论语》的成书和承传等问题。

一，《论语》的成书和承传问题。柳宗元就《论语》所记指出，孔子弟子曾参最少，老死，是书记其将死之言，去孔子之时甚远，当时诸弟子略无存者，“卒成其书者，曾氏之徒也。”

(《论语辨》)此说被后来学界所认同。又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,汉初有“《古论》二十一篇,出孔壁中,两《子张》;《齐论》二十二篇,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;《鲁论》二十篇,《传》十九篇。”这说明当时的《论语》还没有定本。《艺文志》又记曰: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汉兴,有齐、鲁之说。传《齐论》者,昌邑中尉王吉……胶东庸生,唯王阳名家。传《鲁论语》者,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,安昌侯张禹,皆名家。”这个记载表明,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内容各有不同,且各有师传。西汉末,张禹为成帝师,《汉书》本传记曰:禹“以上难数对己问经,为《论语章句》献之。始,鲁扶卿及夏侯胜、王阳、萧望之、韦玄成皆说《论语》,篇第或异。禹先事王阳,后从庸生,采获所安,最后出而尊贵。诸儒为之语曰:‘欲为《论》,念张文。’由是学者多从张氏,余家寝微。”这说明,张禹的《论语章句》之所以“尊贵”,乃是综合了“齐、鲁之说”,被学界认可,因而取代其他各家流传于世,也就成了《论语》的定本,学界称之为“张侯论”,此后各类注本多以此为底本。这是《论语》承传上的一个大变化。

二,此后《论语》的承传衍变,大多是受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变迁影响的,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对此有所评述。皮氏说:从西汉元帝、成帝到东汉,是经学“极盛时代”,“汉初不任儒者,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,封侯,天下学士靡然乡风……宰相须用读书人,由汉武开其端,元、成及光武、明、章继其轨,经学所以极盛,此其一。”汉武时博士官“置弟子五十人”,昭帝“增满百人,宣帝末增倍之,元帝好儒,能通一经者,皆复……是以四海之内,学校如林,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,为古来未有之盛事,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。”这表明统治者的倡导

和需要，是导致“经学兴盛”的主要原因。

“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，今文者即所谓隶书”，相当于时下人所尽识之“楷书”；古文者即所谓“籀书”，相当于时下人们不能尽识的“篆隶”。这还只是文字上的不同。皮氏进而指出：“汉人最重师法。师之所传，弟之所受，一字母敢出入；背师说即不用。师法之严如此。”但在“分立博士”时却有“背师说”的也立为官学；再加之刘歆“欲立古文诸经”，因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皮氏指出：“可见汉时之争立学者，所见各陋，各怀其私，一家增置，余家怨望”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则认为这个做法，是为了“网罗遗失，兼而存之。”

皮氏是今文学家，对今文学特别维护：“前汉今文说，专明大义微言；后汉杂古文，多详章句训诂。章句训诂不能尽履学者之心，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，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。”皮氏强调指出：“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，将欲通经致用，先求大义微言，以视章句训诂之学”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《儒林传赞》称，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到汉平帝元始年间，计一百四十多年，“传业者寝盛，支叶繁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利禄之路也”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，大师“著录门徒”有多至九千，甚至万人的，其所以如此者，“汉人无无师之学，训诂句读，皆由口授，书皆竹简，得之甚难，若不从师，无从写录；负笈云集，职此之由。一师能教千万人，必由高足弟子传授。如郑康成在马季长（融）门下，三年不得见者；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。”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还有两项显著成绩：一是前汉学人“多专一经，罕能兼通”，后汉经师兼通数经者却多有，如“何休精研六经，许慎五经无双”；二是“前汉笃守遗经，罕有著述，章句略备，文采未彰”；后汉经师著述动辄几十万言、百万言；这是因为“风气益开，性灵渐启，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，其不及前人之质朴

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。”前、后汉经学另一个重要区别，乃是“前汉重师法，后汉重家法。先有师法，而后能成一家之言。师法者，溯其源；家法者，衍其流也”；“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，今文之外别立古文，似乎广学甄微（《文选·西征赋》注，甄微，言表明衰微之学，指立古文经传事），大有裨益于经义，实则矜奇炫博，大为经义之蠹。”正如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所说：“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”就今、古文对立形势而言，如《后汉书·范升传》所记：“各有所执，乖戾分争，从之则失道，不从则失人也。”这种状况，使生徒无所适从。皮氏指出：“盖凡学皆贵求新，惟经学必专守旧。经作于大圣，传自古贤。先儒口授其文，后学心知其义，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，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，世世递嬗，师师相承，谨守训辞，毋得改易，如是，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。若必各务刳获，苟异先儒，骋怪奇以钓名，恣穿凿以标异，是乃决科之法，发策之文，侮慢圣言，乖违经义。后人说经，多中此弊，汉世近古，已兆其端。故愚以为明、章极盛之时，不加武、宣昌明之代也。”这就是皮氏一再强调“汉武帝之时经学为最纯正”的原因。从汉武帝到后汉明帝、章帝一百多年经学演变的历史，是一段极复杂的历史，皮氏从今文学角度作了清理和论述（其中有夸大今文经学功绩和不符合事实的毛病，见后），揭示了两汉帝王对经学的关注促成了经学的兴盛，同时也造成了若干矛盾和障碍，这对后人了解经学演变的历史是有益的。

在今、古文学对立和师法、家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，生徒无所适从，汉代经学又如何发展呢？皮氏就郑玄的业绩作了论述。“盖以汉时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学者莫知所从，郑君兼通今古文，沟合为一，于是经生皆从郑氏，不必更求各家。郑学之盛在此，汉学之衰亦在此。”据《郑玄传》所载，“郑注诸经，皆兼采今古文”。郑“注《论语》，就鲁论篇章，参之齐、古，

为之注云：‘鲁读某为某，今从古。’是郑注《论语》兼采今古文也。”（周予同注：“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本，参考齐论、古论，而为之注。”）皮氏指出：“郑君博学多师，今古文道通为一，见当时两家相攻击，意欲参合其学，自成一家言，虽以古学为宗，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。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，见郑君闳通博大，无所不包，众论翕然归之，不复舍此趋彼。于是郑《易》注行而施、孟、梁邱、京之《易》不行矣；郑《书》注行而欧阳、大小夏侯之《书》不行矣；郑《诗笺》行而鲁、齐、韩之《诗》不行矣；郑《论语注》行而齐、鲁《论语》不行矣。汉学衰废，不能尽咎郑君；而郑采今古文，不复分别，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，则亦不能无失，故经学至郑君一变。”皮氏对这个变化作了进一步分析：“郑君杂糅今古，使专门学尽亡；然专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。今古之学若无郑注，学者欲治汉学，更无从措手矣！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。郑君党徒遍天下，即经学论，可谓小统一时代。”“郑学”的兴起，显然是适应了当年学界的需要出现的，也是对“经学必专守旧”局面的突破，“守旧”或说“固守师法”是符合统治者愿望的，但“求新”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。皮氏对于今文学师法、家法的失落，显然是遗憾的。

“郑学”的兴起，并非汉学演变的终止。皮氏说：“郑学出而汉学衰，王肃出而郑学亦衰。肃善贾（逵）马（融）之学，而不好郑氏。贾逵、马融皆古文学，乃郑学所自出。肃尝习今文，而又治贾、马古文学，故其驳郑，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，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。不知汉学重在专门，郑君杂糅今古，近人议其败坏家法；肃欲攻郑，正宜分别家法，各还其旧，而辨郑之非，则汉学复明，郑学自废矣。乃肃不惟不知分别，反效郑君而尤甚焉。伪造孔安国《尚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注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共五书，以互相证明，托于孔子及孔氏

子孙，使其徒孔衍为之证，不思《史》《汉》皆云安国早卒，不云有所撰述。”

由此看来，两汉二百多年“兴旺发达”的经学居然落得这样一个结局，是大出人们意料的。刘歆、王肃的“作伪”，反映了学人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，也缺乏学人自律精神，汉王朝对此弊病以宽容待之，致使这种痼疾贻害无穷，至今绵延不绝。“郑学”的兴起，却反映了学术研究求新求异倾向是不可限定的，皮氏对“郑学”作了两面分析，还是可取的。

“魏晋时代”，皮氏称之为“经学中衰时代”。“两汉经学极盛，而前汉末出一刘歆，后汉末生一王肃，为经学之大蠹。”诸经之真伪由此驳杂莫辨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为“十三经”之一，“虽采郑注，而不尽主郑。”（周子同注：“何晏字平叔，南阳宛人，以才秀知名，好老庄，作《道德论》及诸文赋著述，凡数十篇。”《集解》是晏与孙邕、郑冲、陈群、曹羲合注，以晏为主。晏在《论语集解序》中说：“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，兼讲齐说，善者从之，号曰张侯论，为世所贵。包氏周氏章句出焉。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至顺帝时，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。”邢昺疏云：“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‘包咸字子良，会稽曲阿人。建武中，入授皇太子《论语》，又为其章句……周氏不详何人。’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序录》：“何晏集包咸、周氏、马融、郑玄、陈群、王肃、周生烈之说，并下己意，为《集解》。”）梁启超《儒家哲学》指出，何氏《集解》“在当时很通行，其思想支配到朱程一派。后来朱注出现，何注渐衰。”这是《论语》承传上又一大变化的反映。

南北朝是所谓“经学分立时代，其时说经者亦有‘南学’‘北学’之分，此经学之又一变也。”这期间颇受关注的是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，《南史》本传称皇氏“所撰论语义、礼记义见重于世，学者传焉。”皮氏说：此书“名物制度，略而弗讲，多以老庄之旨，发为骈俪之文，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。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，即此可见一时风尚。”此书曾经劫难，于南宋

时失传，康熙九年，日本山井鼎称其国有是书，乾隆间始传回中国。这是《论语》承传上又一个变化的反映。引者按：皮氏此论有偏颇，《皇疏》对文本内涵的阐述，时有可观之处（见后）。

皮氏说：“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，于是郑学行数百年；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，于是朱学行数百年。”其所以能如此者，“两贤”不只是“学术贯通，实由制行之高卓也”。皮氏称清代是“经学复兴时代”，原因之一是“上能尊崇经学”，二是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等，“皆负绝人之姿，为举世不为之学，于是毛奇龄、阎若璩等接踵继起，考订校勘，愈推愈密，斯为近因。”再有则是“朱子在宋儒中，学最笃实，元明崇尚朱学，得朱子之旨。朱子常教人看注疏，不可轻议汉儒。又云：‘汉魏诸儒，正音读，通训诂，考制度，辨名物，其功伟矣。’”这说明朱熹在清代学人中，是受尊重的。清代经师“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：一曰辑佚书，二曰精校勘，三曰通小学。”这使清代学术“屡迁而返其初，一变而至于道。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，且皆知今古文之分。门径大开，榛芜尽辟，论经学于今日，当觉其易，而不患其难矣。”这个“结论”，和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对清代学术成就的肯定，是很相近的，它反映了皮氏对清学是极重视的。

《经学历史》揭示了古代学术发展的主线，涉及了中国学术史的许多问题，对后人是很有借鉴意义的；其缺点和局限性似乎也很明显，最主要的是以今文学为立足点来讨论学术史，对汉初今文学的“功业”颇有夸张甚至悖谬之处，如说“武（孝武帝在位54年）、宣（孝宣帝在位25年）之间，经学大昌，家数未分，纯正不杂，故其学极精而有用，以《禹贡》治河，以《洪范》察变，以《春秋》绝狱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，治一经得一经之益，当时之书，惜多散失。”且不说这些事例有多少根据，

论者是越出了“经学史”的范围来“表彰今文学”，显然离题甚远，是难以置信的；又说“汉儒言灾异，实有征验”；并说“畿纬”之文“合于经义者近纯”。此论非但不能说明“今文学”的高明，恰恰揭示了“今文学”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揣测。此外，皮氏似乎被今文学“一叶障目，不知其他”，从来不说今文学的毛病或不足，其研究方法有什么缺失也从不言及，“独抱遗经，固守师法”，能保持今文学的“纯正”吗？能促进它健康发展吗？康有为是晚清富有开拓性的今文学集大成者，梁启超明确指出了其思想弱点，一是“依傍古人而立论”，自弃其独立性；二是随意“比附西学”，贻害学界（见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。康氏默认了这个批评。比较而言，皮氏就缺乏梁启超这种清醒的认识。此外，皮氏依据今文学看问题，对何氏《论语集解》、皇氏《论语义疏》就不能从社会思潮变迁上来评断其意义；皮氏很看重朱熹，对其《论语集注》不重训诂、“以理释仁、释道”的毛病也不置一词；皮氏看重清学，却无视于晚清时期面临“亡国灭种”的危局，其眼光远不如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敏锐，他们看清了“朴学”无益于国计民生的事实，从而意图从今文学中获得启发，开掘出救国救民的方针大计来；皮氏是今文家，却不能从“微言大义”中申述一义，未免是“智者一失”了。

历史表明，任何学术思想都是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反映。孔子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奠基人，其思想主张固然值得尊重，却不能范围后人的思想。正如梁启超在《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》一文中所说：“孔子原为彼时代彼国土之人说法，未尝以诏万世，安能一一适用于今日，且不适用又安足病？彼其时犹封建，今则大一统也；彼其时席地，今则凭椅；彼其时服牛，今则驾汽；其礼文制度什九不周今用，固宜尔。”（《饮冰室文集》第四册）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永远

是流动变化的，古不如今，后来居上，是历史趋势，世上也就没有“万古长青”不变的学术或学派。据统计，《论语》注约有三千多种，时下人们熟知的如张侯论、郑注、何解、皇疏、朱注、张居正解、刘氏《正义》、程氏《集释》、康注、钱解、杨注、李读等等，看似“济济”，实则“九牛一毛”。某注本能流传于世，在于它有“适合人群需要”的优长，反之，它必然被遗忘淘汰。这虽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，究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人们接受古代文化，都是从切身利益来认同的，只有这样，人们也才有“温故知新”的收益。

三，笔者开手《论语集义新编索解》时，就意图把“烟战”以来直至今日诸多名家对《论语》的评论作一番清理，选择其中的“名论”，作为新时代喜读《论语》者的参考，这有益于人们“温故而知新”，有益于了解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大趋势，也使本书能符合前辈依据时代潮流“解经”的传统。素愿虽好，或因笔者见识不广，识断不精，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目的。即便如此，笔者还是遵循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古训，且如弩马负重爬坡，奋力为之。

为了使《论语集义新编索解》承接前人解经的传统，笼括百多年来诸多名家对《论语》的阐述，笔者特别关注了下列几个问题：

（一）借鉴前人“解经”之法，略有心得：《四书集注》是朱熹苦心经营四十年形成的一部“解经”之作，他说，此书“添一字不得，减一字不得。”“如秤上秤来无异，不高些，不低些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“四书”的体系是：《大学》讲“德”，《论语》讲“仁”，《孟子》讲“心”，《中庸》讲“理”。四者综合起来，就是引导人“复归天理善性”。（参见束景南《朱子大传》）《集注》被明清两朝定为取士的经典著作，显然是有道理的。笔者反复阅读此书，对朱子治学精神每有感受。朱子不重训诂，

以“理”释“仁”、释“道”，很受诟病，但他对文本的解说，多有精当之论。如“学而时习之”章，朱子解“习”字曰：“鸟数飞也”。这真可谓“慧解”。又如“雍也可使南面”章，朱子解曰：“言仲弓宽洪简重，有人君之度也”，这是对“南面”非常简明、恰当的解说。此类例证甚多，令人心服。我仿效此法，颇有收获。如“伯牛有疾”章的“亡之”一语，我以当代口语“没治了”解读，较之一些旧注，自觉更贴切些。又如，“子谓公冶长”章，对“可妻也”一语，我以俗语解之：“可以给他娶个媳妇”。和一些旧注相比，似乎更符合孔子原意。这里略举两例，以说明我在解读文本上的特点。

（二）借鉴前人“章句训诂”之法，也有收获：程树德的《论语集释》是很受学界称道的一部书，著者在抗战烽火中，身患中风顽疾，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，孜孜不倦完成了心愿，全书征引书目680种，对每本书论述的节引都有针对性，有时还加“按语”表明己见，是非曲直，了了分明。此书嘉惠学界之巨，是值得称道的。程先生坚忍不拔的精神，严谨治学的态度，尤其令人钦佩。在“侍坐”章中，程氏就朱子、程子的“谬解”尖锐指出：“所谓与点者，不过与汝偕隐之意。而以为人欲净尽，天理流行，已属隔膜之谈。况又以为具备尧舜气象，岂非痴人说梦哉！”这是“击中理学要害”之论。与此同时，对于朱注取“上已祓除说”极表赞同，对“汉学家因攻朱之故，务事事与之相左”的偏见，则极力反对。两相对照，反映了程先生对朱注的公允态度，不是“一好百好”，也不是“一坏百坏”。如此公允评论学术上的是非得失，非常难得。《集释》给人的启发甚多，值得学习。

这里，略说我在章句训诂上的收益。比如“攻其异端，斯害也已”章，我借鉴《集释》引述焦循“序异端使不相悖”的见解指出，这是摆脱了旧注单向思维方式，揭示了孔子之言深

层的具有辩证思维特色的内涵，揭示了事物利弊转化的关系，魏源在《筹海》篇所提出的“师夷之长技以治夷”的救国方针，就是对孔子此言最好的注解；进而联系“五四”及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“西学”的事实，说明儒学不但不“排斥异端”，而是以“包融态度”来化解“异端”，其结果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。这样理解孔子之言，显然有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。又如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章，注家提出了各种不同解说，我引《礼记·天运》“选贤与能”，以“与同举”为例，认为本章当是“孔子少讲个人私利，却举说命，举说仁”。这样解说，符合孔子思想实际，行文也颇顺当。

（三）“以经解经”，“以史解经”，是经学研究中受称道的方式。《雍也》篇“可谓仁之方”章，《集释·阮元·研经室集·论仁篇》曰：“为之不厌，己立己达也。诲人不倦，立人达人也。”此说可谓“以经解经”的典范，富有新意，且有深度，但这样高明的解说不多见。“以史解经”事例证甚多。例如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”章，只读文本，很难了解孔子为什么离开卫国。《集释·苏子由·古史》：“孔子以礼乐游于诸侯，世知其笃学而已，不知其他。犁弥谓齐景公曰：‘孔某知礼而无勇，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，必得志焉。’卫灵公所以待孔子，始亦至矣，然其所以知之者犹犁弥也。久而厌之，将傲之以其所不知，故问陈焉。孔子知决不用也，故明日遂行。使其诚用，虽及军旅之事可也。”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对孔子离开卫国的原因就一清二楚了。此例说明“以史解经”是一种很切实重要的方式，笔者受启发后，有不少类似的解说。如“公山”章，引述了《左传》有关公山的记述后，再引述诸家不同见解，最后揭示孔子的本意。又如“舜禹之有天下”章，就“禅让”说，引述了燕王哙禅让子之事，还引述了顾颉刚、杨宽等人的评论，使读者对此有一个清晰的了解。又如“晋文公谲而不正”章，引述了

顾德融《春秋史》对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的论述，使读者对历史有一个全面了解，也有益于领会孔子之言的含义。笔者还引述了梁启超论“霸政”的历史作用，使读者对霸政的文化内涵能有更多的了解。

（四）近、现代学人从沟通中西文化的角度出发，对孔子思想作了许多新的阐述，有申述、有弘扬、有辩驳、也有非议。这是历史潮流导致的新现象，也促成了孔子思想和世界文化接轨的新机遇。诸多论述，约有下列一些议题：

（1）“仁”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，“里仁为美”章，尤受注家珍视。笔者引述梁启超强调“独立自主”的人生态度，对时下青年们是很有参考意义的；又引述梁氏对中、西不同的价值观的对比分析，认为只是讲“仁”而不讲“义”，是不利于中国和同胞们生存发展的；在中西文化接轨中的，“里仁”未必是“优秀的居民点”。梁论是促进中、西文接轨的脱颖之论，值得举国上下思考。

（2）以“季路问事鬼神”章为据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俩高度称颂孔子的“无鬼论”思想，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爽的空气。梁启超就西方人嘲笑中国人“信多神”，明确指出中国人“尊神”以“崇功报德”为宗旨，较之一般的宗教信仰似乎更有其合理性。

（3）孔子和《周易》的关系问题，是引起争议的问题。“加我数年”章、“南人有言”章，引述了钱穆、李镜池等人的论述，明确指出孔子和《周易》是没有关系的，孔子“以意解说”爻辞的错误尤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这是两千多年来解说不当的问题。

（4）又如“民可使由之”章，梁启超、梁漱溟、李泽厚等人引述美国林肯为政“三介词”，和孔子思想作对比。梁启超认为林肯的主张虽好，至今也难于实践；孔子主张却能说且能做